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朱绍杰 实习生 李铮

独家专访《张荫麟传》作者、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欣荣——

张荫麟：岭南“史学彗星”，为中国史学“凿开一径”



李欣荣



与梁启超的“私淑之谊”

羊城晚报：梁启超与张荫麟之间有怎样的师承关系？

李欣荣：首先，二人同为广东人（梁启超为鹤山人，张荫麟为东莞人），当时在京的广东学人交游十分热烈。其次，梁启超成名甚早，在戊戌变法时期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思想界领袖。而张荫麟出生于1905年，在他的青少年时期，正值梁启超著作风行之时。因此，张荫麟熟悉并喜读梁启超的著作，也是时代风气使然。

1920年结束欧洲考察后，梁启超的思想出现明显转向。他不再直接投身政治活动，而是转向文教领域，到清华讲授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课程。正是在清华园中，张荫麟得以亲聆其教。尽管梁、张二人在课堂及私下有所交流，但并未建立严格的师徒关系，更多体现为一种“私淑之谊”。

张荫麟被视为梁启超史学精神的传人。但他秉持“吾爱吾师，而吾尤爱真理”之精神，指出梁启超在考据细节上存在一些疏误。正是有感于梁启超的“史才”示范，张荫麟明确提出历史书写应兼具“科学性”与“艺术性”，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自身的历史书写中。

在通史撰述的内容取向上，张荫麟也明显承袭了梁启超的路径。梁启超晚年曾计划从“文化史”的视角重构中国通史，而张荫麟的通史写作，强调“社会的变迁，思想的贡献，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，兼而并详”，可视作对梁氏通史路径的延续与实践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侧重专题考据的风气中，张荫麟坚持以通史写作为重心，展现出独特的学术旨趣与史学方向。

羊城晚报：张荫麟上世纪20年代在京的学术交游，对他的学术路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李欣荣：1922年至1929年间，张荫麟在清华求学七年，其间受到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吴宓等多位老师影响。同时，在北平的学术环境中，他还受到“南学”（陈寅恪语）圈子的影响。当时有一批广东籍学人在京活动，比如梁启超、陈垣、容庚、容肇祖、伦明、陈受颐、梁方仲、黄节等人。张荫麟的学术交游甚广，无疑是探索广东籍学人在京学术网络的一条重要线索。

张荫麟非常善于向同道学习，也善于与人合作。通过参与《清华学报》、《弘毅月刊》、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等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，他逐渐建立起广阔的学术交流网络。通过不懈努力，张荫麟逐步在学界崭露头角。在清华期间，他获得《学衡》主编吴宓的赏识，进而受知于陈寅恪；虽经陈寅恪推荐进入北大和中研院史语所未果，但他却给傅斯年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并于1934年受傅斯年推荐，负责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，开始撰写《中国史纲》。

在与同辈学人的交往中，容庚与他私交甚笃。容庚比张荫麟年长十一岁，成名较早，时任燕京大学教授、《燕京学报》编委会主任。他帮助张荫麟在《燕京学报》上发表了多篇文章，不仅缓解了张荫麟的经济压力，也显著提升了其学术声誉。后来陈寅恪在推荐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时，主要依据这些发表在《燕京学报》上的成果。

《中国史纲》启示：勿陷入“灯下黑”局限

羊城晚报：《中国史纲》独特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李欣荣：张荫麟在《中国史纲》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。他在自序中申明：“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，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，不参入考证，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，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。”这种写作方法，使其既立足于扎实的研究，又重视叙述的可读性。

在史料使用上，张荫麟主要选取如《楚辞》《诗经》等具有文学色彩的原始文献，而且引用极为节制，力求节省，旨在增强文本的感染力与说服力。在内容组织上，他采取“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，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”，其余大事仅作背景勾勒。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个人偏好，而是建立在对学术界已有成果及个人研究的融通之上。

羊城晚报：今天的历史学者很少进行通史写作的尝试，是出于什么原因？

李欣荣：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走向而深，呈现专门化的趋势，史学界尤其是。在近年史料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，以往的珍本秘籍随手可得，即便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史学问题，学者需要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，研究亦难免越来越“卷”。一旦扩大研究范围，个人的精力与处理能力往往难以支撑。尤其是青年新锐，已基本放弃撰写新的通史甚至断代通史，而更倾向于投入具体专题的研究。

但是，这种专题导向的研究也面临另一层的困境：如果对历史整体脉络把握不足，即便在某个问题上钻研很深，也难以准确定位该问题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和重要性，容易陷入“灯下黑”的局限。

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

羊城晚报：张荫麟对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和多维度训练，对他的历史研究有何影响？

李欣荣：张荫麟在致张其昀的信中提到：“国史为弟志业，年来治哲学，治社会学，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。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，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。”在他看来，哲学、社会学是对史学研究有帮助的。

他特别注重逻辑学，尤其是现代数理逻辑，经历了非常扎实的学术训练；同时又主张“不以哲学为业，而以哲学上之旁观者谈哲学”。因此张荫麟治史学，去除哲学之晦涩难懂，而取其逻辑思维的精华。比如他在《中国史纲》的序言提出通史的现实选择标准问题，可谓前无古人。大家都说通史要写最重要的史实，但张荫麟却反问“什么叫重要”，并在哲学的层面讨论“重要性”。在哲学思维的引领下，他总结前人通史写作的经验，得出通史“笔削”的五条标准：新异性的标准、实效的标准、文化价值的标准、训诂功用的标准、现状溯源的标准；在去世前又补充了“决定性”的标准，一共六条标准。

再如文学。作为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的书评健将，张荫麟始终以文学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写作，“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，但又保持一些文学的风味，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用心”，强调要有“作家的尊严”。

羊城晚报：如果将张荫麟放入当下

中国自主历史知识体系建构的语境中，作为一位“博通而不分科”的史学家，他的学术道路能够为今天的史学人才培养提供哪些重要启示？

李欣荣：张荫麟追求博通的研究路径，提醒我们，今天所熟悉的学科界限并非一成不变。治学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，也是民国学人的一大特点。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并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：一方面，他作为留美庚款生，本就无固定专业；另一方面，对其颇有影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就是采用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的指导方式。因此，张荫麟基本上是在一种“无科可分”的学习环境中广泛阅读、自由探索。为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、《东方杂志》等刊物撰写各类文章的经历，也促使他不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。这一切共同塑造了他“博通”而非“专精”的学术视野。

这种“贯通而不分科”的治学方式，对今天的学人培养有着深刻的启示。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的实际研究中，文、史、哲本应相互交融，只有打通界限，才能真正显出各自的长处。对人文领域的学生而言，更应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，去探索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，而不应被既有的学科框架所束缚。许多学科分类是后设的标准、带有主观色彩的，而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是早已存在的。如果直接套用20世纪之后形成的分科观念，反而可能限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。

在研究具体问题之前，最好先进行跨学科的阅读与思考，汲取不同领域的养分，并具有“为我所用”的思想自觉。如此，学问方能做得更开阔、更深远。正如钱穆所言，当年真正立志为青年写通史的，仅有他与张荫麟两人。



锡耶纳日记

从弗洛伦萨去锡耶纳的火车只有四节，车速不慢，但路上停很多站，托斯卡纳的艳阳下，高高低低的小城小村都很美，车程一个多小时。天色晴朗，我们就在山顶一家小餐厅吃午饭，便宜又好吃。走去酒店的路上，见路边都是罗马松，经过一个城门，高大但有残缺，看得出古城气象。在酒店休息片刻，就步行到城里去。

古城之内任意走走，娴静的中世纪城市，打从我们宋朝的时候就有了。先走到著名的市政厅，据说古代是九人执政，于是有九条线均等地在地上铺出来，辐射市中心的广场。广场上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，塔楼和弗洛伦萨的乔托塔很像。我们又走到锡耶纳大教堂，先看到对面一个礼拜堂，一个胖胖的修女面色和蔼地看我们走进走出。继续走到对面的大教堂，顶层彩窗透进阳光，光线是蓝色、金色的，非常迷人。教堂内外都用黑石，在白色大理石组成的平面上嵌出条纹，教堂两侧的地面上，还有线条生动的平面画像，仔细看都是一些女先知们。

意大利无疑是崇拜女性的，对圣玛利亚和女先知的崇拜就可以证明。这张门票上，好看好几个地方，看完大教堂，又去看后来修建的侧翼，但据说这里自黑色病爆发后就没有再盖，几百年来就只有有一个巨大的石砌的框子，犹如废墟，有意味刺人的思古幽情似的。



愤怒诱饵

天津大学的年度词汇似乎跟社交媒体杠上了，去年选出的“愤怒诱饵”(rage bait)，都带着对网络的强烈批判性。“脑腐”则指“无价值的网络内容带来的精神和智识状态的衰退”，“愤怒诱饵”则批判“经刻意设计，令人感到挫败、受到挑衅或冒犯的网络内容”——仔细琢磨这两个词，其实都预设了一个前提：个体是无辜的受害者，某种外在的诱饵环境制造了极化，带来了脑腐的恶果。

那么，外在的“诱饵环境”是什么呢？似乎就直接归因于算法和茧房了。真在“茧房”吗？当我们说在“茧房”时到底在说什么？前段时间跟一个研究算法的学界朋友聊，她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琢磨的问题：过去信息不发达，传播渠道闭塞，没有网络的时代，没有人需要什么信息茧房；现在信息如此开放、渠道多元、传播迅捷的时代，人们却大谈信息茧房，好像时代在退步、处处都是茧房、人人深受茧房之害。

开放的信息社会恰恰是打破了过去意识不到的茧房。有人说，现在网上观点冲突为什么那么大？因为社会结构复杂，有现代人，有近代人，有古代人，还有半原始人。现实生活中，大家按各自的层次生活，交集不多；但网上，几千年前的观点跟现代观点碰撞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你看，不是网络带来了茧房和观点冲突，正相反，这是一个在“多元信息环境”中打破认知茧房的过程。

愤怒是一种容易上瘾的情绪，那个最大的诱饵在偏执的认知中。最开放的信息环境，最智能的算法，也破不了这种思想上的茧房自缚。



如梦的微笑

在报纸上读到一则让我深有感触的新闻。浙江舟山某亲水度假酒店，在客人退房时，免费赠送青蛙、乌龟等活体小动物。青蛙和乌龟，都是珍贵的生命，却被轻轻地当作赠品随意送出。对于孩子来说，这是唾手可得的游戏，可以像任何其他玩具一样，玩厌就丢弃。

有些人表示：“如果能把活物带回家照顾，也是让孩子接触生命教育的一种方式呀！”问题在于：孩子明白生命的意义吗？孩子有长期饲养与照顾小动物的意愿和耐心吗？我一向反对把带回家饲养的小动物称为“宠物”——纵使是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，一旦失宠，它们的命运，又岂止被“打落冷宫”而已？

好友阿琦，就曾对着三番五次要求养猫的七岁女儿棋棋说：“小动物需要的，不只是生活的照顾而已，它是有灵性、有个性的；它也渴望你时刻的关心、温暖的陪伴。你要养猫，你能许诺给它有始有终的爱吗？”棋棋神情坚定地摇头。母女俩对流浪猫狗收容所领养了一只两个月的小猫。如今，猫儿已经八岁了，棋棋也上了中学。每去她家，快乐的猫儿总对我露出如梦般美丽的微笑。



小说是什么

当我们谈论小说时，我们往往谈情节、谈人物、谈技法。但三岛由纪夫在《小说是什么》中，抛开了这些传统的分析路径，像一位外科医生、一位哲人，直接切入小说的本体问题：小说，究竟为何存在？这本书不是写作指南，也不是文学史，更像是一场深度的意识对话。它追问小说与谎言的区别，思考虚构如何承载真实，探讨小说如何成为一种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。在如今算法推荐和碎片快感主导的阅读环境中，这样一本书显得异常稀有——它不告诉你“如何写”，而是逼你思考“为什么写”，甚至“为什么读”。

《小说是什么》是一束探照灯，照进小说的黑匣子，也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动机与写作欲望深处。它让我们直面一个常被回避的事实：小说的根基并非真实，而是虚构；然而正是这种虚构，往往比现实更接近本质。三岛由纪夫指出，小说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模仿世界，而在于重构现实的记忆与内在的矛盾暴力呈现出来。阅读因而成为一种主动的共谋，读者不是被动接受者，而是意义的共同缔造者。在虚构的镜像中，我们才真正看见自己。

冬日，骑行爱好者们正穿越浙江开化县最美公路——桃下线白渡路段。放眼望去，公路两旁的水杉层林尽染，高耸入云，美不胜收。

随手拍用邮箱：
ycwbwyb@163.com



百事都如意

马年快到了，辞旧迎新，不由想起整整四十年前，著名作家、学者施蛰存先生自制的一枚贺年卡，上录宋代词人赵长卿的《探春令·笙歌间错华筵启》。贺年卡全文如下：笙歌间错华筵启，喜新春新岁。菜传纤手，青丝细切。和气入、东风里。幡儿胜儿都姑姊，戴得更忆戏。愿新春以后，吉吉利利。百事都如意。

贺年卡后附注：“文几，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，兼丙寅春正。施蛰存敬肃。”施先生年轻时曾以赵长卿此词中最后三句，即“愿新春以后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”，制成贺年卡分赠友好。而著名作家、戏剧研究家赵景深先生在他的《作家与贺年卡》一文中特别引用了施先生贺年卡中的这三句词，以表赞同。一个甲子过去，赵先生已在1985年逝世，故施先生忆及老友，重新把《探春令》全词再制成贺年卡，既为纪念赵先生，同时也祝贺1986年新年。

一枚小小的贺年卡，不仅体现了施先生的古典诗词造诣，也凝聚着施先生与赵先生的深厚情谊，令人感动。我曾有幸得到施先生和赵先生的指点帮助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也“忽忆之”。写下此文，一为纪念这两位文坛前辈，同时也借此对《羊城晚报》的读者朋友说：“愿新春以后，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。”



93年后和繁漪女士聊聊

四十年前，读复旦中文系时，我的室友选了“曹禺研究”这门课。有一天她回来，选修课程的同学要排演《雷雨》，她的角色是繁漪……四十年后，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（作家、剧作家）在《收获·长篇小说2025冬卷》(上)发表了长篇小说《繁漪女士》。曹禺曾说过，繁漪是《雷雨》8个人物中“最早想出来的”，拥有最“雷雨”的性格。他在《雷雨》的序中写道：“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，她拥有行为上许许多多的矛盾，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。”

万方为何在今天，繁漪“诞生”93年后，写《繁漪女士》？万方说，从小到大，她一次次走进剧场去看繁漪，对这个角色自然而然有了感情。这份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，“当我渐渐长成女人，自然而然被她身上危险的魅力所吸引。这引力带着我去向内心的狂野地带……我当然懂得她是可怜的，也同情她，但又觉得她不需要我的同情。这个女人软软子立，痛苦而美丽，足够强大，我给不了她什么，不，也许有一件事，写她？”

繁漪的“求爱而不得”，本质是一个人对自由最强烈的渴求，却遭遇到巨大压抑，终于爆发。她那份被禁锢的痛苦与反抗的冲动，至今仍回响。



最美公路
随手拍
文图 徐曙光